

## 九、独立的丧失

在固始汗向罗桑嘉错供养了十三万户之后，历史似又返回到十三世纪八思巴受忽必烈封为帝师、接受了形式上的西藏的赐予的情况。大皇帝和帝师的例子就这样地重复出现。这种所谓供养既激励黄教坚持其政策，又使蒙古酋长沾沾自喜，急于比美其祖先。可是情况变了，固始汗同达赖喇嘛间的协议没有考虑到中国，而中国不会否认对西藏的主权的。的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只剩下徵索极少的贡品和批准贵族的世袭权力，可是这些正是从元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的权力，中国在任何理由之下都不会放弃的。当时明朝奄奄一息，如上所述，西藏的领袖们已经同满洲发生接触：一旦满洲的皇朝稳定地建立起来，他们怎么能够允许别的政权干涉西藏的事务呢？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否要西藏遭受比那些长时猖獗肆虐全境的战争、天花还要坏的灾难吗？很清楚，黄教只一味地想藉红教的削弱来增强自己的权力，眼光太短浅了。它煽动分裂，只图目前，没有衡量暂时胜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这一次胜利也不过是表面的。事实上固始汗的权力无法同忽必烈的权力相比，因此，达赖喇嘛可以容易地获得西藏行政上的相当大的自治权。不过，正如忽必烈曾经任命一名本勤与帝师并列，本勤兼握行政军事大权，达赖喇嘛现在在他身边也有一名第悉(Sde srid)，有时也叫作萨均(Sa skyon)，实际上其作用与本勤一样。

这名第悉是由蒙古领袖选定并作为蒙古领袖的代表

的；固始汗还选任地方首领〔例如却杰札西多（c'os rgya bKra šis stobs）被封给叶如（gYas rn）的绛（Byan）地（传记，C'a, p. 141）。这样在达赖系统与政治上的至高统治权之间酝酿着一场新的斗争，假如前者占了上风，这首先由于固始汗的继承人的命薄。但是同时西藏贵族不能够眼看着独立如此默默地被剥夺而不抱怨，而黄教占据失败了的对手的封地和寺庙，强迫改宗，以往站在藏巴汗一边的红教及所有其他教派对黄教这个政策不能不怀着新的愤懑。

藏巴汗的去世并没有使斗争完全停息，这证明，虽然藏巴汗有个人的目的，他却代表更广泛的利益并且把他的政策与这些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并没有因屈抑而消失，实际上时浮时沉地一直存留到西藏完全落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候。就在藏巴汗去世的1642年，噶尔巴（sGar pa）再次掀起斗争。班禅险遭俘虏；囊索（nan so）诺布（Nor bu），即达赖喇嘛派驻后藏的代表，被迫放弃江孜逃命。由肖喀巴（žo k'a pa）统帅的叛军包围了精奇，（rDsin p'yi, rDsin ji），但固始汗的迅速的干预使局势恢复平静。这件事以后，蒙古人和黄教徒从刚刚被解放的沃卡（Ol k'a）出发，扑向工布（k'on po），把在那里的约八千人的劲敌消灭。然后，蒙古军队从工布进击，戡平一切反叛：事实上固始汗和达赖喇嘛此时已下定决心摧毁噶玛派及其支持者，使他们不能再反抗。因为蒙古人等从一名俘虏的官员身上搜出一件护身神盒（gau，噶乌），内藏噶尔巴的密谕，从而知道噶尔巴的计划。噶尔巴确实曾经下过命令要杀死固始汗，俘虏达赖和班禅喇嘛；毁掉格鲁巴的寺院，忠于黄教的穷结、日果（Ri sgo）和沃卡移交给孜（rTse）、苏（Zur），和肖喀（Zo k'a）家族，贡

噶 (dGon dKar) 交给噶尔巴的管家，凡是黄教的党羽的财产一律没收，分给那些没有背叛噶玛派的朋友。

红教抵抗黄教和固始汗的领导者是噶尔巴。噶尔巴是一个家族的名字，来源于一地区名（在喀木，即康区）。仁蚌的第巴，衮桑 (Kun bzaa) 之子，有名的敦悦多吉 (Don yod rdo rje)，曾在1481年攻打前藏，此人即属于噶尔巴家族。松巴堪布史上就把敦悦多吉叫作噶尔巴。松巴堪布还提到蒙古人为了报复红帽写的讽刺黄教徒的挑衅诗句而偷去了他的马匹。我们还知道，噶尔父子曾经受到辛夏家的才旦 (Tse brtan) 的邀请。他们是噶玛派的有势力的喇嘛。当噶玛丹均之死致使王室绝嗣时，我们可以断言这些法师就承担了指挥后藏贵族和反对黄教的教派的重任。

无论如何，通过外力干涉，折磨西藏多年的内部斗争总算再度平息了。但和平并未持久。1644年噶尔巴又在洛札 (Lho brag) 活动起来，固始汗当即给予镇压。噶尔巴逃脱，到达喀木 (K'ams)。显然噶尔巴也曾经在西藏南部避难，因为在那里可以依靠不丹的援助。不丹是噶举派通过其法王统治的地方；据欧洲传教士们的记载，似乎不丹早与后藏有密切的联系。对于一场结局无论为何总会影响其命运的斗争，不丹不能够置身局外，其证据就是前藏在1648年派军远征不丹，直抵首邑普那卡 (sPu nag k'a) (p.140)。因为第巴诺布 (Nor bu) 指挥不力，远征失利，军队遁回帕里 (P'ag ri)。与此同时，人心并不安宁；支持胜利的黄教的贵族希望得到报酬，有时要求极不合理。比如机学 (Skyid šod) 的大公对日喀则提出主权要求并且占领了该地；但后来迫于固始汗的命令不得不归还。简言之，战争消灭了一个对手，但给西藏并没有

带来宁谧和幸福的生活。异族的军队滞留在国内，取给养于贫瘠的资源，长时遭受战争蹂躏和疾疫横行已经荒芜的土地因之变得一天天更加贫困。

这时，满族已经巩固了政权，清太宗1643年去世，子顺治帝嗣位。1642年达赖喇嘛曾经派出使团，这是一个对于这些崭露头角的西藏的新主人效忠致敬的行动；不过，那时，正如上文所说，满清皇帝对于西藏的局势的意图表示得不清楚，满清宫廷也看不清楚西藏的事情将如何变化。现在情况不同了。皇帝已取得国内的安定，就能够采取一个远扬声威的对外政策了——这就是中国的世俗传统。所以1646年（火狗年），达赖喇嘛一知道顺治（藏文：Sun tsi）皇帝基的消息，就派出蒙古人渥巴锡吉亚台吉（O pa si K'i ya tai ji）奉书致贺（传记，p.133）。1651年（铁兔年）清室派来官员延请达赖五世罗桑嘉错和班禅；班禅以年老为词谢绝了，但罗桑嘉错，在八月二十九日，接到邀请书信后的第三十多天就带着约两百名随从动身来中国了。随从中有不少蒙古酋长。

达赖五世传在这里记载着旅程、描写觐见皇帝、参观北京的宫殿的情况，还开列一张从清廷领受的礼品的单子。会谈自然涉及前藏后藏的局势（gnas ts'ul）。在十二月十六日会见到皇帝，1653年二月二十日达赖五世罗桑嘉错就动身返藏，接受了“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拉达赖喇嘛”（Nub kyi lha gnas c'es dge ba bde par gnas pai sañs rgyas bka' lun gnam 'og gi skye 'agro t'ams cad bstan pa gcig tu gyur pa 'gyur med rdo rje a'can rgya mts'oi bla ma）的封号，以汉、蒙、藏字体刻



在金印上(p.209)。

他返回西藏，一路上每程每站都受到隆重的迎送接待；他在途中许多地方停留，给一些新寺院主持开光仪式，或主持修复残破的寺院，其中有那些过去俺答汗与达赖三世锁南嘉错建立而被察哈尔汗破坏了的寺院。

他一回到西藏，就马上对他辖属下的大批寺院僧侣进行整顿；格鲁派的声威和权势因蒙古酋长们连续的奉献也大大地提高了，已经立于不拔之地，而其它教派，被战争弄得贫困不堪，不再获得当地贵族的支持，现在走向没落或者全部消亡，被迫放弃了他们寺院。

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看一下《黄琉璃》(Vaiḍūrya serpo)里所载的格鲁派寺庙名单是颇有趣味的；这里显示一个缓慢但不间断的古老的喇嘛教的名刹转化为新教派的过程。但达赖五世罗桑嘉错不以此为足；他在这些寺院同他的中央政权之间系上一条牢固的纽带，他委任他信得过的堪布(k'an po)和寺院住持。这时候，没有一件事不经过达赖喇嘛批准和同意能够办得成。那些招惹他怀疑的住持他就随心所欲地免去职务，例如协噶尔寺(ṣel dkar)住持被免职就是一例(p.248)。有时为了进一步加强两个民族间的联系，为了证明蒙古人在宗教上的完全成熟，我们看到，他还委派蒙古人做一些寺院的堪布，例如在江孜，出身固始汗本翼的一个乌喇特人额尔德尼耶歇嘉错(Erteni Ye ṣes rgya mt'so)就当上了堪布。

更有进者，他绝不放过任何使这一大批僧众依附于他的机会；1655年，他恢复了背诵经典的老作法，藉此命令各大寺的喇嘛轮流到拉萨来。后来，在第巴锁南群培去世时，他乘机在拉萨召集了一次庄严的集会，参加的喇嘛竟达十二

万人(p.273)。

显然,宗教和仪式等都不外是一种藉口,带着阅军味道的多次集会含意在于同西藏人民中的精萃部分保持接触,因为只要控制住寺庙就等于统治了全部西藏;这样甚至其它派别的僧人也被这样一种力量的炫耀所引诱,只好承认新派的胜利是既成事实而唯命是从了。

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和由此产生的许多寺庙的独立自主,带来僧侣行为的极度放逸,不拘绳检。僧人们往往做出坏榜样来,不但不严守戒律,甚至违犯道德准则。这就使达赖进行一次调查,其结果是1663年的一次各类寺庙和寺庙人口的清查。按照僧侣的清修程度分为三级:看他们过着洁净(gtsan)的生活还是不洁净(zan)的生活,看他的操守是好还是坏,看他们致力学经的热情是多还是少。第一等是熟悉怛特罗的精意,不过度炫示法术的僧人;第二等是单纯地遵行戒律的僧人;第三等是在家僧人(ser k'yin),即娶妻的僧人。

在第一等纯洁的寺院中——大部分是格鲁派的寺院,包括750座寺院,约50,900名僧人;第二等,流品混杂的有400座寺院;第三等在家僧人(btsan btsun)和苦行男女僧人,有650座寺院,20,000名僧尼。这样,我们共有1,800座寺院和100,000名僧人(p.333)。

这次寺院的清查还附带在全藏推行新的财政改组:每座寺院都给予一定的收入,用以赡养僧众并供给正规地举行宗教仪式(man ja)的费用。其来源是分配给每座寺院以一所庄园(溪卡gzis ka),叫做法溪(mc'od gzis),其收入特定用于做法事。

对差民也进行了清查，以户(门槛t'eb)为计算单位，因此清查称为t'eb ʔdsin(但有时仍用老名称dud，如《黄琉璃》，见上文第23页)。每份封地必须提供一部分实物租税的，称为Lag yon, Lag ʔbab, 系一定克(k'al)的青稞。

有时，按当地出产，可以代替以其它实物，如牛油、盐、青稞粉(t'ug t'al)。

和实物租税并行的还有劳役。或者实物租税和劳役交替着征收。

我们把《传记》和《黄琉璃》的材料汇在一起，可以看到达赖五世所设计的财政制度的全貌。这一财政制度象征着全国的经济完全被宗教政权(theocracy)所控制，这样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是在一个教派不仅代替了其它教派，也消灭了一批老贵族——或者连根拔掉，或者置于役使之下时，政治领域里发生的变迁在经济上的继续。

专门为了视察和管束喇嘛们，罗桑嘉错常常外出旅行。其宫廷人员和忠实的蒙古酋长们随着他，周遊全藏。1654年他和固始汗一起所作的一次旅行，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他进入了以前对手坚持抵抗的据点，视察了曾经武装反抗他的地方，其叛乱的中心点并没有消除，他做了许多拨乱反正的事，取得了许多接触，甚至稳定了许多人的情绪。但旅行突然结束，因为固始汗病了。固始汗回到哲蚌寺，在十二月十七日死在那里(p.235)。

固始汗死后，他的子孙的政治智慧和个人威望都远远赶不上他，他们互相猜疑，兴趣不止在西藏，还关心远方蒙古发生的事件，所以固始汗的去世和其子孙的继位倒使达赖系

统进入一个更繁荣的时期。达赖的权势登峰造极。西藏内部，红教好象放弃了反抗，蒙古的宗主权由于上述理由越来越凋萎，确实这里还存在一位第巴，但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一直被达赖喇嘛及其宫廷用巧计牵着走。这时第巴是索南群培。从罗桑嘉错传里关于索南群培的简要的记事以及他死后所获得哀荣看来，这个人无疑是把统治权拱手让人的。

可是第巴这个头衔用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不仅指蒙古王的第巴；实际上同一头衔也给予了所有地方贵族的首脑人物。这就表示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首脑人物统治各地不再用自己的名字了，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是由一个最高的政权所封赐准许的了。

在所有这类第巴中，日喀则第巴，囊索诺布(Nor bu)据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好象也称“第悉”(sde srid)。《达赖五世传》上说他是第巴(sde pa)的幼弟。他可能是噶玛丹均的一个弟弟，为了保存最少一点点权力，不放弃其家族的抱负，他及时转到黄教一边。他在同不丹作战中表现得暧昧，故意败退下来。假如我认为他属于藏巴汗家族这一点能成立，这个行为就可以得到解释，连系到他酝酿的新的反抗<sup>(143)</sup>，这个看法就会更加清楚。

同时，因为罗桑嘉错所开始的调整改组工作在继续进行，在地平线上不时出现乌云；1656年谣传要同尼泊尔打仗，这使第巴下令把济咙(sKyid sgroñ)的觉卧帕巴瓦底神象(Jo bo ḡp'ags pa Va ti)<sup>(144)</sup>运到西藏腹心的安全地区，第巴诺布就把它送到哲蚌寺，后来这神象被庄严地安放在布达拉宫。



此外，他们在拉萨想抹掉一切关于不丹战争的不光彩的印象，并镇压一个公开支持红教反对黄教从而形成经常危害内部安全的中心。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在进行，在军事之外还有宗教方面的准备。所有天神力量，护法和饿鬼(Yi dam)都请来协助。他们询问了乃穹护法神(gNas c'un)的预言，把西藏的最了不起的咒师们召集来祈禳。一切神示回答都好象吉祥，于是1646年七月军队向不丹进发。

但军事行动非常迟缓，没有利用敌人后退的良好时机；军队在本塘(Bum t'añ)耽搁了好久，结果瘟疫为患，不得不退回帕里(p. 251、ff)。这次不丹又逃脱了，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尽管军事上屡屡失利，达赖喇嘛的威望却继续增长，我们看到1656年印度国王使节到来的记载。编年史上大书特书这位使节是当时统治几乎全部印度的国王的幼子，孟加拉大公；他父亲名字是śakradśa (sākyarāja, 释迦王)，看来是 Shāhjahān 一名的讹写，儿子叫 Sa ha su ja，此即 Shah Shujā的转写，这时已经被其父任命为孟加拉总督。

我们说过，固始汗的逝世，和第巴的无能使达赖喇嘛越来越独立自主。固始汗留下两个儿子；札西把都(bKra šis Ba' a.dur)和达延汗(Dayan Khan)，开头好象两人一起管事：《达赖喇嘛传》在许多年记事中谈到rgyal po sku mc'od gnis “兄弟双王”。但他们却是在固始汗死了很多年后在1659年才来到西藏的，这时第巴已死，五月二十八日按照蒙古风俗哭祭已故的领袖，自然也视察一下西藏情况。只当这年他们才离开了青海来到西藏，对他们来说蒙古当时的情势远比西藏使他们烦恼，所以他们在西藏停留的时间很短，很快离开了，显然他们认为长时间离开原驻地是危险的。

这样第巴死了，国王不在，达赖喇嘛照旧几乎天天接见从蒙古各地区来的部落酋长和寺院住持，感到自己的威望不断提高，享受着真正的独立：少数蒙古驻军的头目也接受了他的指挥。但当他认为自己最安全的时刻，后藏又策划收回失去的一切，这回是由第巴诺布发动的，他在日喀则准备并指挥了这次叛乱。达赖喇嘛和其宫廷担心局势：两位蒙古王好象对西藏的事情不太关心；当局势越来越危急，还得一再吁求他们干涉。诺布又受到后藏贵族的支持，也得到萨迦法王和主巴派白玛喀波(Pad ma dkar po)的鼓励。所以叛乱选择了一个好的机会：蒙古王不在西藏，被另外的麻烦事牵住；蒙古王的临时代表第巴又死了；达赖喇嘛的自私自利的政策招来不少反感；后藏在水马年(1642年)为独立而进行的那次战争，记忆犹新。

诺布被达赖五世描写为天生要指挥别人的人(ran bzin lhun gyis grub pai dpon po)。虽然宗教约束着他的外表，但他的发号施令的精神仍然清楚地表现出来(p.276)。拉萨再次在武力之外，乞求咒术，作忏悔，行祈福，同时装配准备侵入后藏的部队。

叛乱的中心又是日喀则和日喀则宗。班禅从札什仑布寺写信试求和解。战争在进行着，但逡巡不前，一方面诺布不能再指望1642年噶玛丹均所徵集的军队，噶尔巴还避难喀木不能返回；另方面黄教徒也很着急，因两位国王还没有下决心回藏。直到1659年十月二十五日两位蒙古王才抵达西藏。他们一到，事态就很快地发展到头，诺布及其徒众打算经过帕里逃到盟友不丹那边，但在同月二十九日落到敌人的手里(p. 298)。

新的叛乱就这样平息下去了，达赖五世以倍增的精力开始巩固他的统治。后藏的事件证明了必须指派一名第巴去那里防止当地贵族中野心复燃和宿怨再萌。为了这个理由，罗桑嘉错听从几方面劝告任命一位新第巴，很清楚，这个任命权属于蒙古王，所以达赖虽先已接受了其臣僚的建议，只能附和国王的决定。此时国王是一位，不是两位了，因为藏文编年史从这时记载西藏的世俗怙主仅一名国王，名达延汗，虽然兄弟二人出于宗教动机偶而也一齐驾临藏地。所以，达赖五世的信使来到达延汗处，达延汗同意，1660年七月十三日，济善(Jai san)被隆重地任命为第巴，在同一场合，还接受陈列嘉错(P'rin las rgya mts'o)的赐名。而同天国王得到了“丹津”(bsTan 'dsin)如他父亲昔年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称号，从这以后他称为“丹津达延杰波”(bsTan 'dsin Da yan rgyal Po) (p. 297)。他在1660年从他的驻地达木('Dam)来到西藏会见达赖喇嘛，而他的哥哥当时在青海(p. 302)。此后就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件了。1662年二月十三日，札什仑布寺的班禅罗桑却吉坚赞(BLo bzan c'os kyi rgyal mts'an)去世，达赖喇嘛立即为他的迅速转世举行了仪式。我们现在就要谈这件事。

由于一系列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一部分——，格鲁巴在前藏有较大的发展，这里有他们的主要寺院，他们是从这些寺院发迹的。在后藏地区，只有一座大寺——自然，我现在不讲较小的寺院——其奠基人是宗喀巴的最大的弟子之一，我指的是根敦主巴(dGe 'dun grub pa)所建立的札什仑布寺。在前一百年内，札什仑布寺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当若干地区同前藏爆发极剧烈的磨擦，红教派和格鲁派的裂痕

已无法弥缝时，札什仑布寺是黄教在后藏腹心的一个前哨，其首脑不得不执行一种巧妙灵活的策略。札什仑布的首脑长时间内只不过是寺院的住持，先后继任次序如《黄琉璃》所记（p、194 ff、），松巴堪布史（p、325）总结说：班禅桑波札喜（Bzan po brka sis）（铁虎年即1410年生）在六十六岁时任札什仑布寺堪布直到他六十九岁去世（1478）；班禅龙日嘉错（Lun rig rgya mts'o），班禅耶歇孜摩（Ye sēs rtse mo）、根敦嘉错（dGe ʼdun rgya mt'so）、阿里巴拉尊罗桑丹贝尼玛坚赞（mNa' ris pa lha btsun BLo bzan bstan pai ŋi ma rgyal mtsan）、班禅释第巴罗追坚赞（Ṣanti pa bLo gros rgyal mts'an）、班禅敦月嘉错（Don yod rgya mt'so）、乃宁却结却季坚赞（gNas rñin C'os rje C'os kyi rgya<sub>1</sub> mtsan）、襄东却贝嘉错（Sans ston C'os dpal rgyal mt'o）、秋迺巴索南贝桑（P'yug gžun pa bSod nams dpa<sub>s</sub> bzan）、娘敦（SP：Myaṅ）达木却牙佩（Ňaṅ ston Dam c'os Yar ap'el）、囊敦拉桑罗追（Naṅ ston Lha bzan blo gros）、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生于火兔年（史文误作水兔年，1567）。

后者曾经监督了达赖四世的教育，并曾经多年有效地帮助罗桑嘉错，用他的学问和经验来支持他，后来被达赖五世庄严地安置在札什仑布寺的宝座上。札什仑布寺的班禅系统从他开端；他的前辈只不过是寺院的住持，由住持们指名，由公认的黄教领袖即哲蚌寺堪布选定，前后相继任职。而现在这位班禅，在令人愉快地发掘出来“伏藏”（gTer ma）里指定为无量寿佛（Ts'e dpag med）的化身，因而是佛法在尘世上的反映，从此就不再是会死亡的凡人。转世的理论就这



样也应用于班禅，实际上《黄琉璃》在他和他的化身罗桑耶歇 (BLo bzañ ye šes) 之间并没有安放一个中间阶段，仅说他取了一个罗桑耶歇的名字 (mts'an)，来到前藏宣扬佛法，并给达赖六世灌顶。同样松巴堪布在引用罗桑却吉坚赞的名字以后就接着说了以下对于前代堪布从未说过的话：

“（然后）他的新的化身 (sprul sku) 班禅罗桑耶歇，（继续直到松巴堪布时）现在他的新化身班禅罗桑班丹耶歇 (Pan c'en Blo bzañ dpal ldan ye ses)”。

在某种意义上，隆多喇嘛的表 (Min gi grañs) 也可以作为旁证。隆多表里对罗桑却吉坚赞第一个用班禅衔号。我们从所有材料来看都应该确定他是第一个班禅，华德鲁 (Waddell) 书 (p. 236) 和达斯字典 (Dict, p. 780) 就是这样说的。潘德 (Pander) (n. 47) 和舒勒曼 (p. 237) 把他分别当作班禅三世、班禅四世是弄错了。

《传记》从此不再记录军事事件，唯一的例外是一次工布的叛乱的危险，很快因蒙古国王的干涉平息，并没有用兵，事情发生在1663年 (vol. ca p.p. 330, 332)；廓尔喀在济咙方向的剽掠，被仑珠岗 (Lhun grub sgañ) 大公所击退，同年大公因此受奖 (p. 338)。1669年和1671年不丹的两度入犯也被击退 (Voi c'a p. 71) (p. 268)，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并没有引起严重的战争。特别是后一次只是地面上的抢劫，迅速被边境戍军平定。

达赖五世的活动现在全集中和平方面，似乎对军队不给予特别的注意。只是加强了边境的戍军，尤其在容易受到剽掠的地区，即邻尼泊尔和不丹的边境。蒙古的驻军，上面谈到，（如对后藏战争）他们曾参加战争，本身只是一旦急

需时的后备（保证）力量。

我们仅仅知道在拉萨，在1667年在多吉林萨尔(rDo rje gliṅ gsar)建立了一所武库，里面堆存了各种武器和旗帜，还有一本书，书中包括喀木的和卓巴(Brog pa)的印度武器、汉制武器、蒙古武器的清单(Vol c'a, p.36)。

《传记》因此完全集中记述了达赖喇嘛在行政与文化上的成就；他的值得讚美的对建筑寺院的鼓励；在蒙古贵族和西藏的诚笃的尊信之中他的与日俱进的权威。其他人物在他的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觉察到他的势力的增长，而不得不处于服属的地位：新任第巴陈列嘉错(P'rin las rgya mts'o)（他在1669年死去），其表现只不过供奉寺庙，保护一切宗教活动，而丝毫没有与闻政事。他的继任者罗桑图道(BLo bzan mt'u stobs)也是一样，他在1676年死去，在职六年，同年罗桑金巴(BLo bzan sbyin pa)被选为断任者；他在位也没有好久，在1679年五月即以健康欠佳为理由，而由贵胄(a bar)桑结嘉错(Saṅs rgyas rgya mts'o)代替(Vol. Ia, p. 125)。毫无疑问，这是按照罗桑嘉错狡猾的儿子桑结嘉错事先安排的计划进行的<sup>(145)</sup>。他害怕他的父亲濒临死亡，他希望成为国家的实际主人，从阴影中露头角。抓住到当时为止并没有实权的第巴职位，这职位由他掌握以后，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他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却可以把西藏政府转变为真正有绝对的权力的政府。蒙古国王偶然从青海莅临拉萨，出席宗教庆典，发放大量布施，但他们兄弟二人并不象有较坚强性格的人物，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干涉政务的行动，达赖喇嘛显然渴望把他的宗教威望抬高到世俗权力之上。达延汗在1668年初去世，他的儿子丹津达赖杰波(bsTan ḡdsin Dalai rgyal po)

继承了他，1671年（铁犬年）三月，在拉萨举行的盛大的庆祝典礼中即位。

在桑结嘉错就任第悉以后，达赖喇嘛也许疲倦于极度紧张的生活，实际上从政府中引退了，权力移交给第悉，第悉很聪明地用达赖的名义行事。罗桑嘉错虽然不再积极地忙碌于政治事务，他还活着，而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政务也确实离不开他的指示。在六十六岁时他去世了（不是象 SP.p. 304所说的六十一岁）。他的传记也突然中断于1681年（铁鸡年）九月六日。

在达赖五世统治期间，从不同地方来了访问或遊历西藏的人们。我们已经谈到一些印度使者。另一些是作木朗 (*aDsum Lan*) 王名叫门朱朗 (*Mon aDsum Lan*)<sup>(146)</sup> 派来的，此王屡次遣使，一次在1667年 (*Vol. c'a P. 34*)，使团由吉图班达里 (*Je tu Bha<sup>d</sup>ri*) 率领，一次在1670年由巴昌 (?) 王 (*Pa p'ran (?) ra dsa*) 和译人仑珠 (*Lhun grub*) 率领 (*Vol. c'a, p. 116*)，另一次在1671年由札拉班达里 (*Dsala bha<sup>n</sup> d<sup>a</sup>ri*) 率领。1671年一个尼泊尔使团到来。他们是由尼泊尔王意朗 (*Ye ran*) 的长女婿，萨兰图悉地库马拉札呼 (*Sa lan tu Siddhi Ku ma la dsa hu*) 派来的<sup>(147)</sup>。1671年尼泊尔阳布王派使臣来藏 (*Vol c'a p. 127*)。1670年纳拉哈利王 (*Na ra hari*) 通过印度和尼泊尔派来使者拉摩堪德拉 (*Rāma Candra*) 和叶索曼塔吉利 (*Yasomantagiri*) (*Vol. ja, p. 161*)。1679年西藏曾派人给作木朗的那拉森哈王 (*Narasi<sup>m</sup>ha*) 赠礼<sup>(148)</sup>。

在政治使节到藏的同时，印度学者来了也不少，达赖喇嘛非常欢迎他们，认识到靠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在

拉萨有班智达高库拉 (Gokula)，他在拉萨住了几年并受了戒，并协助达 (aDar) 译师翻译梵文文法；编年史里还提到另外一些贝拿勒斯 (Benares) 的班智达，如《波你尼界经》 (Pāṇinīdhātusūtra) 的译者克尔斯奴达耶 (Kṛṣṇodaya) (Vol. c'a p. 159 和 Vol. ja, p. 43)，又哈利代萨 (Haridāsa) 和甲雅代萨 (Jayadāsa) (ibid. p. 250)。1677 年克西曼吉利 (Kṣemagiri)，一位马杜拉 (Mathurā) 和尼兰堪塔 (Nilakantha) 的高僧 (Sannyāsi)，来西藏 (Vol. ja p. 44)，还有阿阁黎札马吉尔提 (Dsamakirti) (Vol. jap. 45)，贝拿勒斯的则万提 (Dsivanti) 和噶额夏德帕里 (Gaṇeśātepari) 和索达萨木拉 (Sodāsamura) (Vol. ja p. 48)，色那西 (Sēnāsi)，高库拉吉哇 (Gokulagriva) (ibid. P. 53)。1681 年记有班智达高闻达那塔 (Govindanātha) 来 (Vol. Ja p. 244)；其余人记在 1680 年 (Vol. ja p. 175)。

当外人抱着政治或文化的动机群集拉萨时，很自然也会有人为着做买卖而来。战争的结束，内部的相当平静，旅途上的日愈安全，以及更多的福利，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共工程的进行，都给予对外贸易极多的便利。印度人、汉人、蒙古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们都在拉萨市集上见面，交换货物。班智达高库拉 (Vol. ca p. 341) 曾从印度送一封信给一位汉商。在 1661 年，派去里拉米托拉 (Lilamitra) 作为他的商业代理人。

经济繁荣也在增长着，达赖五世传记里记录着几乎每天都有从各地的善男信女们向他赠献礼品；这些人是西藏的贵族或商人、寺院的堪布，但最重要的是蒙古领袖们和蒙古朝



覲者。他们连续不断地前来致敬，带来金银布匹和钱币；从中国也开始流入礼品了，但数量还不多。所有这些财富都进入国库，也就是由达赖和其宫廷来支配，可是确实也对于地方有好处：兴建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在这些兴造上面仍然使用古老的强制劳役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人民所遭受的种种限制和征调，一如既往，可是由于财富的流入，和平的到来，朝覲者的馈赠使全国弥漫着一种幸福的气氛。随着战争的停止，各地法制和秩序的恢复，商业也活跃起来了。常常在慷慨的蒙古的施主们资助下，道路修得更好了，桥梁也架设起来了，蒙古施主认为这些义举是积功德的事。

同尼泊尔的关系，虽然有时因边境上（多在济咙sKyid sgroñ）出现冲突而中断，可是往来频繁了；从尼泊尔来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给装饰殿堂和寺庙，使住持们和贵族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了。同中国方面也是一样。这种物质繁荣带来艺术和文化的复兴。皈依的人们的慷慨布施刺激了宗教建筑物的营构或装饰，因之使还没有失传的当地艺术传统再度繁荣起来，同尼泊尔人、蒙古人和汉人的艺术家们可以比一比高低了。

这时出现了恢复古代译师光荣传统的思潮。人们再研究梵文，在多罗那他（Tāranātha）刚刚重译出《萨罗婆缚底文法》（Sarasvativyākaraṇa）时，达赖五世叫人研究梵文文法科学的基本书即波你尼（Pāṇini）的文法并且把它译成藏文。达赖喇嘛以其对学者的尊重和本人渊博的知识激励大家努力研究。他在佛教文化的每个领域都有著述，他的活动能力格外使人惊异，因为我们应记得，他并不是过着一种隐居生活，而是直接指导西藏的命运，从来没有少做一点工

作。

无疑，罗桑嘉错在进行寺院改革时，就已经打算普遍地恢复经典的研究传统，他的儿子桑结嘉错，确实成为当代最了不起的学者之一，就证明罗桑嘉错对他周围的人们的求知生活曾给予不懈的关怀。这是罗桑嘉错事业中的积极的一面。西藏人称呼他为“伟大的五世”是完全公正的。黄教因为他的功劳取得胜利，结束了内部的斗争——其递相胜负消长的主要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依次叙述了。前藏和后藏的世俗方面的仇恨消释了；贵族被制服了，不能够再抱有旧时的野心了。西藏几年来响往的统一和平，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派所不能推动的统一和平，到这时就这样达成了。当然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还会有一些遗恨难消，但每件事情都表露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旧事都会忘掉，在西藏，一个和平盛世已经在望。但是为了这个已经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达赖五世在追求恢复故国的伟大光荣的同时，已经为它的灭亡准备了条件。

罗桑嘉错和一个外来势力联盟的业果快成熟了；只要西藏承认某些蒙古部落在西藏行使保护者的权力，那么西藏就不能不受到这些部落的政治组合的兴亡的影响——这些在西藏边境上的部落往往随意组成一个政治实体，一个跟随着一个，个个都是由它们的酋长们的智谋或勇敢而结成的瞬间消逝的王国。蒙古人对于达赖的笃敬似乎总在加深，但不久就清楚了：佛教还没有能够软化这些游牧部落的掠夺本性，想遏制他们掠夺习性简直无能为力。

随着康熙皇帝在中国登基，西藏的局势就自然更加严重了。康熙不能放弃中国当时对西藏的世俗的保护权，而在蒙

古发生的事态和蒙古草原的动荡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充满危险的野心，把康熙帝的注意力更加引向帝国的西部边疆。这样西藏就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一方面中国和蒙古都不放弃他们的企图，另方面西藏已不再有力量和可能执行一种独立自主的政策。所以达喇赖嘛的国家被迫寻找无穷无尽的方案，试图利用蒙古事件，和在噶尔丹顽强的领导下组成的准噶尔帝国同中国之间的裂隙。

西藏的政治现在由达赖五世的私生子桑结甲错驾驭，他继续罗桑嘉错的政策，仍然加强黄教的权力和威望。若干年内局面没有变化。除了西藏同拉达克打了一仗，一般说这次战争是僧格南杰的儿子德丹南杰（bDe ldan rnam rgyal）对待黄教的态度引起的，当时德丹南杰公然声称他信奉主巴派（看《黄琉璃》，p. 366）。战争的进退曲折，大家都已熟知，无庸再述；只说一下这次远征结束时（实际上结局对拉萨有利，虽然藏军在拉达克因莫卧儿帝国的干与而遭到失败），桑结嘉错开始在阿里地区巩固了黄教寺院，因此，托林（mT'ö gliṅ）的喇嘛在1687年增多，1686年（火虎年）在西藏同拉达克的新边界上修建了札石刚（bKra ṣis sgaṅ）寺。

罗桑嘉错的死使局势更为复杂。时世极度艰难；转世的理论实际上服从于深秘的利益支配；一朝达赖去世，一些世家和集团从其本身政治利益着想，都渴望达赖转生于他们之中，这时他们的野心欲望勃然而生。我们已经知道：在那个独一无二的时刻，为了完成达赖三世的工作和服务于教团的利益，达赖四世锁南嘉错如何安排转生在蒙古人中。桑结嘉错懂得这些事情，看到蒙古政治形势相当混乱，因此秘丧不

发从1682年到1697年长达十五年之久。可是在这期间他还是认定了达赖五世的转世灵童，这就是1683年出生的仓洋嘉错（T'sans dbyañs rgya mts'o），并且让札什仑布寺的班禅罗桑耶歇贝桑波给他剃度（《黄琉璃》p.196）。

桑结嘉错隐瞒达赖五世死讯的理由是他已经观察到蒙古噶尔丹已经组成一个准噶尔帝国——噶尔丹童年时就曾经在拉萨学经。西藏把自己放在和硕特蒙古的保护之下，现在既然脱离了孤立状态，其命运就同噶尔丹与中华帝国的对抗形势息息相关了：桑结嘉错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与一方结盟，在一方押下他的赌注。康熙在1696年六月十二日击败噶尔丹，使之从胜利走向失败的经过，大家都已熟悉，用不着在本文里再做一次扼要的复述。因为这篇文章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大家还不知道的或者研究得还不充分的藏文史料，简单地叙述西藏历史发展过程。

桑结嘉错看到噶尔丹早期的成功从而断定噶尔丹拥有实力，想依靠他摆脱和硕特部和汉人的控制，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差不多与噶尔丹失败同时，固始汗的孙子达赖汗，一称拉特那（Ratna）死了，遗留二子，权力转入其长子丹津旺秋（bsTan 'adsin dbaṅ p'yug）之手。但次子拉藏（Lha bzang），贪嗜权力，为了攫夺和硕特汗位而杀害了丹津旺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准噶尔帝国受中国的军队打击后元气尚未恢复的期间，因之也正值那一度聚积在蒙古上空的骇人的乌云已被驱散的时候。拉藏汗利用了这个形势，想在西藏复兴其祖先为本家族取得的统治，在这个目的上，他取得中国的支持，中国当时有理由怀疑桑结嘉错，不忘记桑结嘉错的同情准噶尔人和秘丧的阴谋。达赖喇嘛新的化身的放荡行为又



同时并发，使桑结嘉错的处境更加复杂。传说中的达赖六世也许有不少随意渲染的成分，围绕他个人发泄的感情一直过多，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准确地重构他的性格，可是就连在达赖六世死了几年后来到拉萨的西方传教士都说，他差不多是一个耽爱淫佚放荡而厌恶寺院的严峻清整生活的人。另一方面他并非完全屏除经典的研究；现存几篇短的讚颂文就是他的手笔，不过一件件风流韵事和轻佻的贪欢取乐的生活使他无法认真清修。

在桑结嘉错周围，意见远远不能一致，精神上的统一仅仅虚存于表面，而且不过是由一个胜利的派别所强制推行的统一，并非自然而然地出自人们的意愿。黄教的敌人们，其他派别的党羽们，倾向于同中国友好，就过甚其词地大讲西藏教会最高领袖的奇异的行为。有一个喇嘛寺院，被这些政治潮流所激动，竟宣称佛性业已离开这位年轻的达赖喇嘛。这样达赖的内在神性和宗教实质被剥夺了，逐渐失去了一切威信。于是拉藏汗和中国人采取行动的時刻到了。达赖喇嘛的精神的真实性成了疑问。群众对他的神圣性格的一致的信仰陷于幻灭。他不再是一尊神，不再是西藏的怙主，这些都成了议论的话题，他是一个神圣的职位的篡夺者，虽然他并非自觉要篡夺这个地位。这时准噶尔人在失败后还没有恢复，所以无意反对中国。对此拉藏汗经过深思熟虑，得到中国完全同意，带着几百名兵士，进入拉萨，几乎不血刃而占领当地(1705年)，杀死桑结嘉错，从布达拉宫带走了年轻的仓洋嘉错，但是黄教不想他们的领袖这样轻易地被取消，何况乃穹护法神(gNas c'uñ)还显灵说仓洋嘉错是真正的转世。所以当蒙古军队押解仓洋嘉错经过哲蚌寺附近时，喇嘛

们进行了突然袭击，把他抢了出来，但拉藏汗的兵士占了上风，攻进哲蚌寺，又把仓洋嘉错俘虏了；在黑河(Nag c'u)附近，仓洋嘉错丧命。

关于这些事件和继之而来的事件，西方传教士的记述可以补充藏文和汉文史料的不足。特别是第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神父的关于西藏的复杂曲折的情况的记述、包括在藏时的耳闻目睹和在来藏前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不过拉藏汗对这位神父的保护，神父同尊信者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损害了他表达印象的公正性和对拉藏汗行为的准确评断(见Account of Tibet, ed. by De Filippi p.163)。第西德里关于桑结嘉错的情况是从桑结嘉错的敌人那里听到的，说的自然有利于胜利者，因此第西德里绘出了第悉桑结嘉错的道德堕落的画象，同时也就美化了蒙古汗王的仪容。据第西德里记述，蒙古拉藏汗曾经两次几乎被桑结嘉错毒死，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致力追求绝对权力的狡诈多端的第悉同固始拉的孙子的关系上想必早已发生了裂痕。但第西德里本人不能隐讳在拉萨陷落时用了欺骗手段使桑结嘉错落到敌人的手里的事实。不过他写到拉藏汗本人时还是溢誉过甚的。

这些事件也见于达赖七世传记，其中续记自火狗年1706年四月十七日以来仓洋嘉错的痛苦的经历。书中写道仓洋嘉错准备牺牲自己，在哲蚌寺喇嘛们把他救出来时还想跟蒙古人一起走，以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因为当时热振寺的喇嘛和噶秋巴阿旺贝衮(bK'a bcu pa Nag dba'i dpal mgon)似乎准备同蒙古人打一仗。仓洋嘉错的去世据云是途中得了暴病结果(p.110ff.)。

这样拉藏汗志愿已遂，他恢复了对西藏的控制，成为局

势的主宰，显然他对于达赖六世的态度却没有赢得黄教信徒们或大多数西藏人民的同情。年轻的仓洋嘉错在其中成为受难者并非主角的若干事件、他的结局、乃穹护法神显示的预言，这一切都使人们忘掉或者原谅了他的弱点。现在人们又普遍对他怀有好感了，他的奇怪举动被解释为神的一种朦胧隐晦的行为，神是永远使其行为顺应于人们的造业的准备的。拉藏汗希望自己的事业有最后的结果，找到一位医学札仓的僧人，经过一些忠于拉藏汗的先已证实达赖的精神转生于此地的喇嘛认定把他命名为达赖七世，这位候补者阿旺意希嘉错（*Ṅag dbaṅ ye šes rgya mt'so*）尽管中国政府给予承认，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参看Desideri书，p.151）。

这位僭教主是软弱无能的一类人物，其受推举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拉藏汗的政策更不受欢迎，因为乃穹护法神宣布达赖已经转生在靠近中国的边界理塘附近了（土鸡年1708年七月十九日）。挑选靠近天朝这样近的地方显然是有一定理由的：在所有能够左右西藏的政治力量中，中国不但是最强大的，而且依着几百年的一贯传统，对西藏内部政治从来不施加过分的压力。这次达赖降生于理塘好象是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决心恢复西藏对中国的柔顺的附庸的旧关系的一次尝试。还有，在西藏，人心还是如此动荡不安，新转世的达赖回到西藏会激发强烈的感情，导致发生痛苦的事情，对于这类往事，人们的记忆犹新。中国人民很懂得这一切，他们同青海的新酋长们一起以极大的注意力监护新转世的达赖，这样，新的达赖就能成为他们手中的有利工具增进他们的野心。拉藏汗看着他拒绝理塘的新达赖没有成功，就千方百计要掌握这个小孩子，但终归失败（《达赖七世传》pp. 18，

20及以下)。可是此时准噶尔帝国复兴了，噶尔丹的姪子策旺阿拉布坦，开头曾经反叛了他的叔父以此赚得康熙的信任，在他打败了哈萨克、吉尔吉斯人以后、又倒过来采取噶尔丹的反对中国的政策，并转而格外注意西藏事态。一些同拉藏汗同中国有敌对情绪的集团挑唆他起来干（Desideri p. 151）。蒙古人的驰名的皈依佛教使他们的领袖们不能对西藏教会的危机漠不关心；喇嘛教早已广泛传播于蒙古人之中，占优势的是格鲁派，因此，精神上的一致性使这些游牧部落与那个使他们回心转向的光明来源的本土紧紧连系在一起。在蒙古地方很快建成的寺院都是西藏的学经大寺院的分院，到处蓬勃发展，寺院的住持都曾经在西藏受过教育，藏语是祈祷时使用的语言，僧俗人众往往采取藏名；这样一个文化上的一致性已经慢慢地形成，结果促使蒙古人关心西藏正在酝酿中的事态，对于西藏他们不能视如异域。现在在这些宗教动机之上又移植了政治阴谋和政治磨擦；这就是：策旺阿拉布坦策划从西藏消灭和硕特及其中国的保护人的霸权。因此1717年他命令其弟策零敦多布（Ts'e rin don grub）向拉萨进军。

他依靠的是西藏大寺院的喇嘛，尤其是色拉寺、日喀则寺和哲蚌寺的喇嘛（Desideri p. 143）。这些喇嘛都在惊惶失措中，因为达赖喇嘛还没有获准驻锡藏境，而除达赖以外，他们不肯承认任何神圣的权威。他们代表着一个巨大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力量，也因残存的贵族的有效的支援，势力得以增长。所以策旺阿拉布坦可以指望一个非常强大的西藏集团的支持，而同时，拉藏汗已经失去更多的民心，甚至在他本人的近侍的小圈子里、在大臣们和宫廷官员里也正在酝



酿着叛乱，即便这个阴谋被发觉，灾难也不过推迟到来而不可能阻止。

拉藏汗在黑河附近遭到袭击，抵抗无效，被迫退回拉萨，闭城坚守。背叛者在1717年十二月初一打开围城的城门。十二月三日布达拉宫遭到进攻，拉藏汗逃走未遂，被害。拉萨遭抢掠三天，朋友和敌人都没有饶过。侵略者亵渎了神殿，抢走了其中贮存的多年来虔信的蒙古人供献的珍宝；连达赖五世的坟墓也没有受到尊敬。

以上是Pistoia耶苏会士的记述。这段故事从这些不幸事件的最权威的见证人之一的传记的有关段落得到证实；我指的就是班禅罗桑意希桑波的传记。在这个传记的第277页上记着七月十日才得知准噶尔军队集结的消息，八月一日同策凌敦多布的入侵军队发生遭遇战，最后甘丹寺的池巴和其他大喇嘛几次极力进行调解，但他们的干预没有获得任何效果，双方首脑争吵剧烈，言语粗暴。在十月八日后，拉藏汗从达木来到拉萨，深藏在布达拉宫，闭关不出，班禅也同时在那里。传记接着说十月十七日准噶尔人进攻拉萨，二十九日拉萨陷落。守城者逃散，拉藏汗从布达拉宫逃出未遂，十一月初一日被害(*Ṣa kya dge sloṅ blo bzaṅ ye ṣes kyi spyod tsul gsar bar byed 'od dkar can gyi p'en ba p.277b*)。

这样西藏就被本应该是它的保护人所蹂躏，变成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公开较量的场所。

在布达拉宫中被俘虏的人们里不仅有拉藏汗的妻子和儿子，还有札什伦布寺的年迈的班禅；策凌敦多布不敢加害这位受人尊敬的住持，因为策凌敦多布住过札什伦布寺，是班禅的门徒；他把班禅拘禁在王宫的一个角落里（Desideri，

p. 161) , 但拉藏汗的属下不少人遭到毒刑和被害; 只有达贡札喜 (Tar gum bkra šis) 总督几经波折倖免于难, 其经过具见第西德里书, 其后此人帮助中国人再度征服西藏。

策凌敦多布的入侵引起康熙方面的迅速反应。清军在1720年也进入拉萨。稍后, 年方十五岁的达赖七世凯桑洛桑嘉错 (sKal bzan blo bzan gyal mts'o) 被安放在布达拉宫的宝座上。布达拉宫也在同时重加修葺。中国人恢复他们的老习惯, 在达赖喇嘛的身旁任命一名第悉以处理行政事务。原拉藏汗的大臣锁南杰波 (bSod nams rgyal po) 被选任此职, 但实际上中国在形形色色的事务上都直接干预。几乎可以作为自由已经丧失的象征, 拉萨城墙此时被拆除了。

西藏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这以后老贵族两次试图恢复旧制度, 都落空了。第一次在1727年, 在达赖喇嘛的默许下, 第悉锁南杰波被杀, 一个恢复西藏完全主权的计划已经制成, 可是同贵族中的一名代表, 后藏的王子, 颇罗 (P'o Lha) 的锁南多杰 (bSod nams stob rgyas) 他是被害的第悉的同僚, 曾接受中国朝廷的封号, 就在迟到的中国军队的帮助下, 给遇害的摄政报了仇, 镇压了谋乱者。这场暴乱终于悲惨地失败了, 达赖喇嘛本人被流放, 另外一名代理人被选来主持教会的事务而颇罗鼐则被任命总理西藏事务, 进爵郡王。

达赖喇嘛后来被清朝送回西藏, 锁南多杰 (颇罗鼐) (死于第十三饶迥的火兔年1747年, 不是SP和柔克义所说的1748年或1746年) 的郡王爵位由其子达赖巴图 (Dalai Batnr) 即珠尔墨特那木札勒 (Gyur med rnam rgyal) 继承。于是在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领导下民族起义集团再次试行复辟, 但驻藏大臣杀死了他, 虽然这第二次1727年叛乱以后,

某些强制放松了，但是把西藏置于中国人的统治之下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体系却明确地建立起来了。